引　言

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，发生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。表面看来，战争带来的往往是血流漂杵，哀鸿遍野，破坏甚至摧毁既有的文明。细加分析，又不尽然。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，那些正义的战争，正是为了捍卫已有的文明。即使是非难论的兼并战争，往往也促使人类在旧的文明的废墟上建设起更高层次的新的文明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成汤灭夏，带来的是令人肃然的青铜文化；武王灭商，创造了令孔子梦寐以求的西周文明；秦灭六国，带来车同轨、书同文的大一统局面；南北朝的对抗，孕育了熔南北文化为一炉的盛唐文明；蒙古人进入中原，带来了多种宗教的并存和中外交通的发达；满族入关，带来的也不仅仅是“扬州十日”的血和恨，而是促成了康、雍、乾的盛世局面。当我们诅咒着战争，感叹着“宫阙万间都做了土”的时候，是否想到过，战争对于人类文明并不尽是负面的影响呢？

中国古代的战争有一个突出的作用，那就是造就了中国古代辉煌的军事思想文化。战争使一批批杰出的军事家脱颖而出，他们经历了长期血与火的洗礼，在不同的时空里把握着战争的规律和战场的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态势，或者在战略上高瞻远瞩，或者在战术上奇正相生，或者擅长突袭攻坚，或者精于防城守隘，或者敏捷果敢战法迭出，或者沉静如山寓法于无法之中。他们在不同的时空里各擅胜场，在中国军事史上乃至世界军事史上留下灼灼辉光。孙武是最典型的例子，即使在主要依靠现代武器作战的今天，孙武的兵法巨著在军事学上仍有重要意义。其实中国古代何止一个孙武，纵观五千年的军事史，兵家云集，将星棋布，其中巨星煌煌，孙膑、尉缭、韩信、曹操、李靖、戚继光等都彪炳史册，业耀千古。他们的辉煌战绩和军事思想，构成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部分。他们不仅活在军事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心中，还流传于平民百姓的口头。尽管在封建社会，“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”，但老百姓最爱传述的英雄，往往正是杨业、岳飞这一类将星。

中国古代战争有明显的阶段性。新旧朝代交替之际，往往战争规模巨大，战争时间较长。时势造英雄，在其背景之下，往往兵家与将星辈出，以不同的风格和思路竞英争雄。春秋末和战国时期，各诸侯国不断扩军，战争愈演愈烈，孙武、伍子胥、吴起、孙膑、尉缭、白起、乐毅等应运而生，或先后迭出，或一时俱起，演出了中国古代兵家史上最威武雄壮的一幕。以后，楚汉之际有项羽、韩信等，三国鼎立时有曹操、诸葛亮、陆逊等，隋唐之际有李世民、李靖等，宋元时有成吉思汗等，明清之际有努尔哈赤等。大凡新旧交替的时期，都要出

现一批杰出的军事家。在一个王朝统治的时期内，大规模的长期战争相对少些，兵家也相对闲暇寂寞。但经常发生的与周边部族的摩擦，与入侵之敌的交锋，与国内叛乱或起事的武装集团的军事对抗，也造就了一批批著名的军事家。西汉的卫青、霍去病，唐代的郭子仪，明代的王守仁、戚继光，清代的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等，都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的。即使和平时期，也有兵家潜心研究前人兵法并参以历代战例而写出值得一读的兵书，也有将帅因安思危而积极备战练兵。不过，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兵家将星，一般不可能达到很高的层次。

中国古代战争有明显的渐进性。从五千年的战争史看，这种渐进性首先表现为战争规模越来越大。周灭商的牧野（今河南汲县南卫河以北地）之战，周兵不过虎贲 3000 人，甲士 4.5 万人，只一个早晨便决出胜负。蒙古与南宋的襄阳、樊城（今湖北襄樊）之战，双方用兵数十万，作战持续近 5 年。这种渐进性还表现为兵器的越来越先进。夏时兵器还以石和木杆为主，到东汉主要兵器已尽为钢铁制品，宋代出现火药兵器，清末军队则拥有了枪炮和铁甲舰。这种渐进性还表现为作战兵种越来越多。春秋以前作战主要靠车兵；到战国步兵成了作战的主要力量，车兵、骑兵和水兵也是战斗的力量；清末的新军，一镇陆军中已有步兵、马兵、炮兵、工程兵、辎重兵、交通兵诸兵种，海军成为独

立的军种。这种渐进性使得战争形势越来越复杂，战场态势越来越不易把握，战斗方式越来越讲究整体配合，对军事家的素质也就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古代兵家的军事思想也应该是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进步的。

中国古代兵家包括 3 种类型。

第一种类型：实践型。这一类兵家多为军中将领，甚至是一国全军统帅。他们或起于垄亩，或发于卒伍，或以部族首领的身份而建军立业。他们身经百战，饱受挫折，部署战役往往能显示大手笔，战场指挥大多得心应手。他们指挥的一些战役和战斗，或转败为胜，或以少胜多，或势如破竹，或循序歼敌，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著名战例。他们或因为戎马倥偬，少有闲暇，或因为性粗质野，本不读书，没有留下传世兵书，也没有形成系统的军事理论体系。但在他们的军事生涯中也常有由实践而生的军事理论的火花闪现，他们留给后人的战例往往蕴含着生动的战略和战术原则。战国时期秦国的白起，西汉的卫青、霍去病，南朝宋的檀道济，辽的耶律休哥，金太祖完颜阿骨打，元太祖成吉思汗，清太祖努尔哈赤等，是这一类型兵家的突出代表。

第二种类型：理论型。这一类兵家多为文人学者。他们少有甚至没有指挥作战的经历，也很少作为高级将领亲自带兵治军。但他们往往勤奋好学，熟读前代兵书，精研古代战例，关注本朝军事形

势，或发奋写成兵书，或再三上奏献策，对历代著名战例有精当的分析，提出了一些前人未能道出的战略战术原则或攻守原则。由于他们对战场变化缺乏实际感受，又不能在战争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，所以他们的军事思想和作战方略一般不能达到很高的层次。北宋的何去非，明代的尹宾商，明清之际的揭暄等，属于这一类型的兵家。

第三种类型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型。这一类兵家是本书要评介的重点。他们或者早年熟读兵书，以后指挥过战役或战斗，长期从戎，熟悉军旅生活，战争实践使他们长年积累的兵学知识得到检验，使原已形成的军事思想和作战方略得到升华。他们或者长期征战，稍有闲暇便读兵书，温史鉴，平居之日便著书立说，总结百战沙场的经验教训，提出系统的治军原则和战略战术。这一类兵家往往研读兵书而不泥于兵书，审时度势，古为今用，留给后人的兵书或军事理论给人以居高临下、厚积薄发的感受。中国古代不少杰出的军事家属于这一类兵家，其中有的达到了极高的境界，如孙武、曹操、李靖、王守仁、戚继光等。

中国古代兵家给我们留下了十分丰富的遗产。这份遗产不仅属于军人，也属于各行各业；不仅是属于中国的，也是属于全世界的。孙武“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”，“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”，“因敌变化而取胜”等军事理论，被各国商界和企业界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孙武、曾国藩等关于军队建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设和管理的原则，被许多企事业团体运用到经营或管理上。王守仁的“知行合一”学说在军事上的运用，也为许多西方汉学家所景仰。我们应该珍惜这份遗产，批判地继承这份遗产。为此，我们首先要认识这份遗产。写作本书的目的，就是希望能陪同读者从中国古代兵学宝库的门窗外向里注目一看，至于升堂入奥，则非本书所能办到的了。

一、先秦兵家群体的崛起

1. 军事形势的变化及兵家群体的出现

先秦的军事形势，春秋中期以前是一个阶段，春秋后期和战国又是一个阶段。在前一阶段，战争规模一般不大，决战时间一般较短，作战形式一般比较单一。夏以前的传说时代，氏族间、部落间经常发生小规模的战斗，地域性部落联盟间的抗争规模稍大些，但作战形式一般比较单一，双方以木、石、骨制的兵器进行搏斗，战败者即向胜利者贡纳方物。夏朝是部落联盟式的早期国家，夏王与联盟各部落首领经常联合起来征服周围的部落，但作战规模仍不大。到商汤攻夏桀，也不过凭借敢死之士6000人，以战车攻击取胜。商的前期也具有部落联盟色彩。到武丁时期，农牧业都有较大发展，国家机器逐步健全，军队中出现师的建制单位，对外用兵每次集兵常在3000人以上。武丁的夫人妇好攻羌方，用兵达1.3万人。西周武王灭商，史称使用兵车300乘，虎贲3000人，甲士4.5万人，但决战只用了一个早晨。西周主要运用车战，作战时双方列好车阵，车上甲士鞭马驰车，挥戈一击，胜败往往由此而定。战车在平原地带奔驰，或追逐败

逃之敌，或仓皇逃离战场，这是西周作战时的常见画面。春秋前期，各诸侯国争霸中原，纷纷扩军，并在政治、经济制度上进行改革，以扩充实力。作战方式仍沿袭西周旧例，战场限于一隅，多为封疆接壤之地，战法仍以一击定胜负为主。著名的长勺（在今山东，具体地点不详）之战，齐军击鼓三通，鲁军方一鼓作气，击败气竭意沮的齐军。胜负一鼓而定，春秋前期的作战基本如此。春秋中期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晋国发展经济，整修内政，军事力量空前强大，成为中原霸主。南方的楚国为争霸中原，长期与晋对峙。西方的秦国和东方的齐国也多次与晋较量。战争规模逐渐扩大，战线逐渐拉长，决战时间也出现延长之势，尤其步兵在作战中的灵活性开始引起军事家们的注意，车战阵形也开始由密变疏。春秋末期，战争的目的往往已不是争霸索贡，灭国扩土已成为越来越明确的战略目标。战争规模明显扩大，一次作战往往动用数万兵力。战场已不限于平原地带，吴、楚间的山泽江河也烽烟频起。不仅步兵与车兵协同作战，水战、海战也开始出现。纵深发展、各个击破的阶段性战法，逐步取代列阵决斗的古典式战法，军事形势进入了新的阶段。

春秋后期开始，许多诸侯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强卿专政，是各大国基本的政治特点。卿大夫转变为新兴的地主阶级，与旧贵族展开激烈的较量。工商业和城市经济在这种较量中得到发展，从

而又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进步。到战国时代，社会经济向前发展，使各大国占有更多土地和人口的欲望大增，于是纷纷进行全方位的改革，以求进一步充实国力，吞并更多的中小国家。例如：在中央确立国君的权威，在地方发展郡县制度，摧毁世袭的采邑，扩大国家的编户，实行全国统一的土地及赋税制度，建立国家统一的常备军，等等。各大国由于已具有雄厚的政治、经济和军事实力，通过战争以统一天下的目标越来越鲜明，于是战争产生了一些新的特点：第一，规模空前扩大。就人数而言，一次作战动辄用兵和歼敌在 10 万以上；就时间而言，因作战往往以攻城夺地为目标，采取长围久困的打法，为时多在数月乃至数年以上；就空间而言，战线往往由城上城下延伸到远郊旷野、山泽林薮。第二，多兵种配合作战。以步兵为主，车兵、骑兵次之，老弱妇女辅之，共同作战，有时还以水师攻坚。第三，战法多样，战术多变。除正面进攻外，还经常采用截击、伏击等灵活机动战术。第四，战争明显具备战役特征。一次作战往往包括野战攻防和城邑攻防相结合、退却与进攻相结合、侧翼作战与正面作战相结合等若干密不可分的环节。第五，兵器有长足进步，增强了攻击力和杀伤力。这些战争特点，为造就优秀的军事家群体提供了重要条件。

总而言之，春秋后期开始的军事形势的大变化，向各大国提出了延揽优秀军事人才的迫切要

求，战争特点为造就优秀军事人才提供了条件；而随着世袭贵族特权的动摇而崛起的士族阶层，又迎合了这种需要。士人们精研兵法战例，剖析列国形势，形成各自的军事理论体系。先秦兵家群体由是而崛起。他们或朝为布衣，夕为卿相，得以一展雄才大略；或投身军伍，屡建奇功，终于得到国君重用。在这个“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；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”的时代，任何一个兵家都不可能局限于纸上谈兵，必须在血与火中去辨别良窳（音 yǔ）。孙武、吴起、孙膑、尉缭、乐毅、白起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，他们不仅在历上留下了赫赫战功，也留下了中国悠久文明象征之一的《孙子》、《吴子》、《孙膑兵法》、《尉缭子》等传世兵书。

2. 中国兵学思想的奠基人武圣孙武

生平与著作

孙武是先秦最杰出的兵家，古代兵学的奠基人，他的《孙子》一书被世界公认为现存最早的“兵学圣典”，他也因此被誉为“武圣”。

孙武又称孙子，春秋末吴国将军，约活动于公元前 6 世纪末至前 5 世纪初。字长卿，齐国乐安（今山东惠民县。另有广饶、博兴等说）人，齐国田氏家族后裔。据说他的祖父田书伐莒（今山东莒县）有功，齐景公赐姓孙氏。孙武的父亲曾在齐国为卿。后因田、鲍四族谋乱，孙武出奔吴国。经吴国大臣伍员推荐，得见吴王阖闾。阖闾知孙武能用

兵，又见其所著兵法 13 篇，遂重用其为将军。传说孙武先在吴宫演练宫女，吴王二姬恃宠违令，被他依军令处斩，初显其治军之才。公元前 506 年，孙武与行人伍子胥、太宰伯嚭辅佐阖闾西向伐楚，在柏举（今湖北麻城东北，一说湖北汉川北）大破楚军，乘胜追击破敌，攻入楚都郢城（今湖北江陵西北）。这就是著名的柏举之战。此战“西破强楚”，“北威齐晋”，史称孙武“与有力焉”。以后，孙武事迹不详。

《孙子》，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，列为《武经七书》之首。又称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吴孙子兵法》，是世界公认的现存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。全书共 13 篇，分别为计、作战、谋攻、形、势、虚实、军争、九变、行军、地形、九地、火攻和用间，计 5900 余字。《孙子》总结了前代的战争经验，充分吸取前代兵书如《军政》等的精华，结合当时军事实践，从战略和战术角度分别揭示带规律性的军事原则，形成了系统的军事理论体系。《孙子》自问世后，一向为人们所重视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本虽为残简，说明当时已很流行。宋代官方颁行《武经七书》为武学必读教材，将《孙子》列为首位，足见其推崇重视。从汉末曹操注《孙子》起，至今关于（孙子》的各类注本已有成百近千。今存世《孙子》，不仅有数十种汉文本，还有西夏文、蒙古文等少数民族文本，另有近 20 种外文译本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充满朴素辩证法光彩的军事思想

《孙子》是孙武军事思想的结晶，内容十分丰富。

孙武强调“修道保法”、“安国全军”的备战观。他指出战争关系到军民的生死、国家的存亡，不能不认真考察研究。战争不能仓猝进行，必须有周密的准备，因为“怒可复喜，愠可复悦，亡国不可以复存，死者不可以复生”。国君要慎重对待战争，将帅要随时提高警惕，才有可能使国家安定，军队保全。“安国定国”的重要条件是“修道而保法”。“修道”，指修明政治，争取民心，使“上下同欲”；“保法”，指确保法度不乱。这里的“法”，不限于指刑令军规，还包括要求掌握好土地、物产、兵员及军力的度，己方条件不足不能贸然举兵，敌方法度已乱正是我取胜之时。

孙武主张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和速战进攻的战略原则。他认为，百战百胜不是绝顶高明，不经交战就使敌人畏服才是绝顶高明。他称不战而胜为“全”，战而胜之为“破”，制定战略目标以“全”为上，“破”次之。所以，上策是挫败敌人的全盘计划，其次是瓦解敌人的外交，再次是重创敌军，攻打敌人的城池只是不得已的办法。不得已而用兵，要先“知彼知己”，进行严密的策划；然后发动突然袭击，“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”，迅速进攻取胜。这就叫“兵贵胜，不贵久”。孙武的战略原则，是根据他所处的时代的经济条件和军事形势确定

的。到战国，战略上速战速决的方针已不很适宜，但其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战略思想，却以其丰富的内涵影响着后人。

孙武注意灵活的战术指导原则。首先，强调战术指导要趋利避害，转害为利，消除和隐藏自己的弱点，捕捉敌人的弱点，以争取主动。所以他说：“不尽知用兵之害者，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。”其次，提出变寡为众的战术指导原则。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，用假象迷惑敌人，造成敌人的错觉，分散其兵力，我方兵力集中于一点，敌方兵力分布于十处，我方就能在全局上敌众我寡的形势下，造成具体作战上我众敌寡的优势。其三，孙武一贯注重“奇”、“正”之变，并以此为战术指导的总原则。两军对阵，以正兵与敌人正面交战为“正”，出奇兵从侧翼攻敌不备为“奇”。他认为，这种奇正相生的原则可应用于各种战术。比如进攻战攻守兼用，我欲走近路，可先走远路以诱敌因贪近路而入我圈套等。孙武的战术指导原则，是对西周“堂堂之阵”的呆板战法的有力否定。

孙武提倡兵将同心的治军原则。他希望民众（尤其是士兵）与国君意愿一致，为君主死，为君主生，都无二心。将帅是实现此目标的关键，将帅须对士兵恩威兼施，即“令之以文，齐之以武”。这“文”，就是怀柔和厚赏，使士卒亲附；这“武”，就是强迫和严刑，使士卒畏服。将帅要处理好“文”与“武”相辅相成的关系，必须兼备智、

信、仁、勇、严五条德才标准。这样，将帅对士兵就能爱而能令，厚而能使，乱而能治。

孙武的军事思想充满朴素的辩证法的光彩。他的从现象探求本质、寻找规律的认识方法，他的关于奇与正、利与害、迂和直、乱和治、弱和强、寡和众、攻和守等相互转化的观点，至今仍有启发意义。当然，他的思想中也有愚民愚兵等杂质，但毕竟瑕不掩瑜。

3. 吴起的富国强兵和用兵治军思想

生平和《吴子》的性质

吴起（？ ～公元前 381）是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。卫国左氏（邑名，今山东定陶西）人，曾以孔子的弟子曾子和子夏为师，好研习兵法。初为鲁将，因遭人诽谤，为鲁君所疑，投奔魏文侯。魏大臣李克向魏文侯推荐吴起用兵之才，遂被任命为将。吴起善于抚恤士卒，很受士卒拥戴，且行事清廉公正，被魏文侯委以重任，统兵驻守西河（今陕西、山西间的黄河），以拒秦、韩。吴起在魏，与诸侯数十战，向四面开拓大片土地。后因魏相离间，为魏武侯所疑，遂奔楚。楚悼王早就听说吴起贤能，用为令尹，主持变法，以求富国强兵。楚国很快强盛起来，向南平定百越，向北并陈、蔡，击退韩、赵、魏之军，向西攻击秦国。楚悼王死后，楚的宗室大臣因吴起的变法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，便趁机起兵杀害了吴起。

吴起生活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，各大国都在寻找富国强兵的途径。吴起厉行变法，站在时代的前列，顺应了历史的潮流。他之后，各大国相机而行，普遍变法图强。

吴起的军事思想集中体现于《吴子》一书。该书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，《武经七书》之一，在战国末年已流传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称“吴起 48 篇”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为 1 卷。今有《续古逸丛书》影宋本及明、清刊本，存图国、料敌、治兵、论将、应变和励士 6 篇。（吴子）继承和发展了《孙子兵法》的有关思想，在历史上曾与《孙子》齐名，并称“孙吴兵法”。北宋颁行《武经七书》，《吴子》名列《孙子》之后。清代以来，曾有人疑《吴子》为伪作，今学者一般认为不伪。

富国强兵和用兵治军的思想

吴起的军事思想最突出的一点，就是强调富国强兵。要整军治武，必得以国家富强为基础。国家要富强，必须“先教百姓而亲万民”。国家的富强，不仅表现在财力的增加，更表现于政治的修明。“修德则兴，废德则衰”，国家安危，“在德不在险”。富国是强兵的基础，强兵是富国的保证。“安国之道，先戒为宝”，积极备战，可避远祸。

吴起的战争观内容比较丰富。首先，他将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种。他认为，战争主要由五种因素诱发：一是争名，二是争利，三是由于国家间的积怨，四是本国或敌国发生内乱，五是本国或

敌国发生饥荒。战争的名义也有五种：禁暴救乱叫“义兵”，恃众以伐叫“强兵”，因怒兴师叫“刚兵”，弃礼贪利叫“暴兵”，因乱人疲举事动众叫“逆兵”。“义兵”是正义的，其他都是非正义的。其次，他强调进行战争要以“和”为前提。他指出，国家内部不和，不可以出军；军队内部不和，不可以布阵作战；阵线内部不和，不可以发动攻势；战场上作战意见纷纭，不可以克敌制胜。凡事先“和”，才能行动，“和”是进行战争的重要前提。他主张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，反对穷兵黩武。

吴起重视军队的建设。他认为兵不在多，贵在于治。治的标准是：平时一切行动中规合矩，战时威严勇猛富有生气，进攻时势不可挡，退却时敌不可追，前进后退有节度，左右移动合指挥，虽然大军被切断仍能各自为阵，虽然大部队分散各小部队仍行列不乱。这样的军队上下同安共危，天下莫当。要达到这样的标准，一要提高将领的素质。一军之将，要文武刚柔兼备，办事有条理、有防备、有决断、有警惕、有要领。要培养善于把握战机的能力，树立令行禁止的威信。统帅还要具备识别下级将领德才的能力。二要提高士卒的素质。要以“教戒为先”，使士卒先具备荣辱羞耻之心。要采取互教互学的练兵方式，“一人学战，教成十人；十人学战，教成百人……万人学战，教成三军”。训练包括利用地形、理解战法、熟悉战阵、娴于兵器

等内容，并注重量材使用。三要赏罚明信，将帅与士卒同甘苦，共安危。四要简募良材，建设先锋突击队。吴起首创考选士卒之法，选拔力大胆勇、速度快捷者组成“武卒”，使之成为名闻天下的精锐之旅。

吴起强调根据敌情制定战略战术。他针对当时邦无定交、士无定主的时代特点，强调在制定战略时要以齐、秦等六国为假想之敌，分析各国民情、经济、政治及军队情况，分别确立对付他们的战略，敌情条件不同，应对方法应该各异。要在不同的军事形势和自然气候条件下，决定利弊和取舍。他指出，两军对阵，要仔细观察敌方旌旗人马状态，由外察内，把握其兵情军心。当发现敌人兵力尚未聚齐、军心尚未稳定、进退尚未定夺时，就要迅速打击敌人，“以半击倍，百战不殆”。他认为，有 4 种战机切不可错过：一是“气机”，即曹刿所说的“彼竭我盈”、一鼓作气之机；二是“地机”，即处于有利于我的地理环境之机；三是“事机”，即敌人内部不和之机；四是“力机”，即我方武器装备、士兵素质优于敌方之机。抓住战机，要“急击勿疑”。

吴起继承了孙武的军事思想，并有一定发展，对以后尉缭等有较深刻的影响。

4. 孙膑对孙武兵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

孙膑的事迹和《孙膑兵法》的出土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